

陈垣与北京图书馆

刘乃和

今年是北京图书馆建馆七十年，《文献》丛刊编辑部嘱我撰写陈垣（援菴）老师和北京图书馆的文章。谨据所忆，简写数则。

提起援师和北京图书馆，不禁使我想起来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，那是援师和我谈起的北京图书馆的历史。援师过去是很少给人写条幅的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因未写专著论文，稍得时间，常为亲友写四五尺行书条幅。他每作书，就到我家，我替他抚纸磨墨。因我父亲喜作篆字，家里纸墨笔砚等用来方便。一次援师见我屋壁悬一徐坊（梧生）字幅，问我是哪里来的，我告以徐坊是我外祖父。他很高兴，说他和徐坊是京师图书馆（北京图书馆前身）的前后同事。从此经常向我母亲闲谈询问，关于我母幼年在家中所常看到的缪荃孙（筱山）、柯劭忞（凤荪）等人与我外祖父徐坊论学情况。

援师和我说：京师图书馆在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八月已开办，那时由缪荃孙、徐坊两人任正副监督，就相当于后来的正副馆长。

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8月，江瀚（叔海）任馆长，仍名京师图书馆。1915年馆址迁到方家胡同。同年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从热河移来北京，刚好援师自广州来京不久，他阅读《四

库》就是在这时开始。他每天到馆，坚持不懈地对《四库全书》研读了十年，对这部包括三千四百多种，三万六千多册的大丛书，作了全面了解。他有关《四库》的多种著作就是这时撰写的。

因《四库全书》过去都在禁中，外人无从阅读，该书详细情况，从来少人了解。1919年左右，有人提出影印《四库》，但必须先知道全书共有多少页，才能决定用多少纸张，用多少人力、物力，才能估计成本作印书计划。援师决定对该书作一全面调查，希望做到心中有数。于是组织人力，请了助手王冷斋等七人，进行清点。他带领七人，每天到京师图书馆，早去晚归。前一天他作好准备工作，写好书目，画好表格，写清要调查的项目。工作时则两人为一组，每部书每人清点一半，然后互换，以为核对。将每部书的书名、作者、卷数、函数、册数、页数等都一一调查填写，最后由一人复校。这工作自1920年五月开始，至八月完成，整整作了三个月。后来时局变化，《四库》印刷事未能实现。1937年他在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的《文津阁册数页数表》，就是这次调查的部分内容。

1921年底至次年五月，援师因任教育部次长的关系，兼京师图书馆馆长。

馆中藏有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八千六百五十一卷，是1910年（宣统二年）甘肃有司采进的。自甘肃运京后，移藏馆中。援师初来京时，听说馆藏敦煌经卷有八千轴之多，很为震惊。他当时正研究宗教史，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佛教以外的宗教史料。他“尝就方家胡同图书馆检其目录”。果然从中发现了“字”字五十六号摩尼教的残经，这是稀有史料，后随其《摩尼教入中国考》一文发表在北大国学季刊。《敦煌劫余录序》中说：“十一年（1922）春，予兼长馆事，时掌写经者为德清俞君泽箴，乃与俞君约，尽阅馆中所藏，日以百轴为度，凡三越月，

而八千轴毕。知其中遗文异义，足资考证者甚多，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、交易契约、鄙俚歌词之属，在昔视为无足轻重，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。”

他天天到馆里阅读敦煌经卷，每天看一百轴，看了整整三个月，将八千多轴全部看完，可见我援师的决心和毅力。

1924年夏，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，援师被推为该会采访部长。他便又在馆中将此八千卷经，仿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前十卷的体式，把每轴的原号、起止、纸数、行数及内容都写出。原号就是自甘肃运京时所编的号，起止就是每轴首二行第一二两字和末二行的倒数一、二两字。他告我，敦煌经卷，多有重字，只写一行一字，不能确定是哪一行；且多是残经，常缺首尾，又因多重字，很多行第一个字都相同，只记一行一字，如前后被剪去，也不能看出。写出经卷前后的两行两字，则残经卷的首尾固定，即便查找，又不至被剪裁盗窃。稿成，名《敦煌劫余录》，因经卷都是外国劫夺之余，书名用此，以志不忘。

1928年，京师图书馆改名北平图书馆，大学院聘请援师和马裕藻（幼渔）、马衡（叔平）、陈懋治（颂平）、黄幼轩（世暉）五人为筹备委员，接收筹备。这年十二月初迁入新址，新址在中海西岸居仁堂。这时共推援师为馆总负责人。这是他第二次参与掌管北京图书馆工作。

1929年八月起，他被聘为北平图书馆委员，后来又连任。九月起与陈寅恪、胡先骕等被聘为购书委员会委员，援师任购书委员会的中文组主席委员。他对图书馆图书的购置增添，制定买书计划，和与藏书家联系转让等事，出了不少力量。

1933年，援师得见武进陶氏藏于敏中手札五十六通。于敏中（1714—1779），乾隆进士、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。在军机处近二十年，谥文襄。书札为于敏中致陆锡熊论修《四库全书》事，有的无月日，有的有日无月，有的有月有日，但都无年，不易知其次序。如按月日计，最早的五月十八日，最晚的

九月初十日，是于氏扈从木兰时所发，而年则不止一年。原件是裱好的册页，但编排却是按月日为次序，不管何年，因此各函内所书事实多有颠倒。援师看后，认为这些函信内容，关系到编纂《四库》情况，多官家文书所不载，都是当时编书的内部情况，外间多不知晓，材料很可宝贵。于是他把这五十六封信细为考证，考出这些信札共历四年，按准确的次序，连续阅读，对了解编书情况极有帮助。北京图书馆认为事关《四库》掌故，关系古籍文献的编修，决定影印发行，以为历史资料。于是按援师考出的次序将原函影印出版，书名《于文襄手札》，后附援师写的《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》一文。

援师曾以北图影印本一册相赠，告我这五十六通书札的时间顺序还应再细考一下。他在赠书末页，题字说：“乃和同学酷爱余考证之文，然考证一毫疏忽不得，如余所编次之于文襄论《四库全书》手札年月，若再将各札内容细究，当发见误编之处不少也。卅二年夏至。”

几十年间，他和北京图书馆的关系密切，他在北京图书馆馆刊及馆图书季刊上曾发表论文专著八篇。他除去担任过馆长等职务外，还经常给馆里提出建议，解答疑难，更经常到馆里看书，借书。过去他写论文，到馆善本室去查书更是常有的事。后来他年事渐长，也不断让我去馆中替他查阅。

他研究元代历史时，因《四库全书》著录的元人文集特多，但《四库》例无书中细目，他为了自己使用方便，编写了《四库》文津阁本《元六十家文集目录》。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赵万里先生因该目录使用便当，馆中亦需参考，乃商得援师同意，录副藏馆中。

1958年，北京图书馆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，并举办展览。征展品于援师，援师将珍藏的康有为殿试卷、黄遵宪撰《人境庐尺牍》墨迹册页和徐继畲《瀛环考略》二册原稿本等，交馆展出。他曾为展览会审查展品，并参加了戊戌变法六

十周年座谈会，出席此会的有史学家刘大年、侯外庐、范文澜、陈叔通等专家、学者。并有康同璧和梁思成先生参加座谈。

他的一生，别无所嗜，唯喜购买图书和文物。文物多史家、学者墨迹、书笺、手稿，不喜藏其他器物；图书都是作学问实用的书，常是为研究某专题而购买的书籍。他常和我说：

“我不是藏书家，不重藏宋、元等版本，也无力购买，只藏我阅读、实用的书籍。”他藏书四万余部，史部书全备，大型丛书不少，其中尤以宗教书籍较全，包括基督教书刊，如全套《圣教杂志》和佛教道教经藏。还有清朝时历、《元典章》等抄本，及其他孤本、抄本书等等，都是很难得的珍贵典籍。他在逝世前写好遗嘱，将他的全部藏书，捐献给国家。现在他的书已交给他所时常关心、学术上与他关系密切的北京图书馆。这是他平生的愿望，也是为他一生心血聚集的书籍找到的最合适的存放地点。现在北京图书馆已将援师的藏书作为馆中特藏，清理编目供专家学者借阅，使这批书籍可以为文化事业继续服务，这当是我援师所高兴并放心的事情。

援师自定居北京，到他逝世，共六十多年。六十年中，与北京图书馆关系密切，他的学术活动得到北京图书馆的很多帮助，他也为北京图书馆的创立、建设以及它的发展、进步，投入过不少力量，最后又把他毕生所喜爱的图书典籍捐献给北京图书馆，在这方面他应是无憾的。今天，北京图书馆在党的关怀和重视下，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，新书成倍增加，新楼也逐渐建起，并且还将有更好更大的建树，它将成为现代化的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，为全国和世界人民服务。我相信，我援师如地下有知，也将和我们一起祝贺北京图书馆的七十周岁，并祝贺它未来的灿烂前景！

1982年7月